

《永乐大典》乾隆御题诗考

张 升

1945年8月,王重民在给胡适的信中提到他曾在英国获见一册有乾隆题诗的《永乐大典》,但因为价格太高未能购得。胡适在随后的回信中对《永乐大典》内有乾隆御题诗表示怀疑,认为其中有作伪的成分。这两通信均被收入《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一书中,其中“王重民致胡适(1945年8月5日)”云:“在英国时,重民曾以六磅(镑)半为北平图书馆买一册《大典》(农字韵)。又有一册是‘馆’字,因有乾隆题诗,索价一百五十磅(镑),当然买不起,据说后来落入日人之手。因为那册内有一书是《清明馆伴录》,乾隆特为那部书题诗。”“胡适致王重民(1945年9月29日)”云:“顷复检吾兄八月廿四日函,有此语:‘如重民在英伦所见乾隆题《清(当作“重”)明节馆伴录》的那一册,当然是题在《大典》上,然后著入《四库》,后来或有忌讳,又改入存目。’……我要请问的是兄所说英伦所见一册《大典》,是否果有御题在《大典》原本之上?我不信《大典》任何一册有御题。所题都是辑抄清本。……若英伦所见之《馆伴录》上有御题,我颇疑此中另有作伪问题。”^①其实,他们关于此事之通信肯定不止这两通,因为胡适在回信中提到王重民还有“八月廿四日函”。笔者推测,胡适在收到王重民8月5日信后,即回信对《大典》中有御题诗表示怀疑,故王重民又在8月24日的信中解释说:“重民在英伦所见乾隆题《清(重)明节馆伴录》的那一册,当然是题在《大典》上。”胡适对此还不相信,坚持认为有作伪的成分。至于王重民再如何向胡适解释,由于无法找到其原信,我们不太清楚。那么,《大典》上是否真的有乾隆御题诗呢?《大典》上为什么会有乾隆御题诗呢?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永乐大典》流传与辑佚研究”的阶段成果,项目号为:10BZS007。

① 以上分别见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台北胡适纪念馆编《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413、423页。

一、《永乐大典》上是否有乾隆御题诗

《大典》上有乾隆御题诗,为王重民亲眼所见,且言之凿凿,应该不会有假。王重民是现代著名的文献学家,对古文献有精湛的研究,其时正为北平图书馆搜求图书(包括《永乐大典》),对其中的真伪应有分辨能力^①;而且,王重民也没有必要骗胡适,或者随便敷衍胡适;再者,在胡适最初表示怀疑后,王重民再次去信说:“重民在英伦所见乾隆题《清(重)明节馆伴录》的那一册,当然是题在《大典》上。”说明其对此事的态度是很慎重的。更为重要的是,王重民看到的那一册《大典》,现在依然存世,收藏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语言学院,其卷次为11312—11313。该册《大典》卷11312所收主要为《重明节馆伴语录》之内容,册前有乾隆御题诗并钤有三印^②。乾隆在此册上的御题诗应为“题倪思《重明节馆伴语录》”:“重明馆伴纪倪思,序语无非饰强词。称侄却思称彼虏,畏人反诮畏吾仪。岂诚强屈弱伸也,祇以言游利啖之。南渡偷安颜特腆,千秋殷鉴慎哉斯。”该诗也被收入乾隆《御制诗集·四集》卷13中。可见,王重民看到的那册《大典》确实是有乾隆御题诗的。

目前存世的《大典》中,除王重民所见的一册外,台北“中央”图书馆所收藏的卷8339这一册《大典》卷首也有乾隆御题诗一纸,原文为:“题陈规《守城录》:摄篆德安固守城,因而失事论东京。陈规屡御应之暇,汤璠深知纪以精。小县傍州或可赖,通都大邑转难行。四夷守在垂明训,逮迫临衝祸早成。乾隆癸巳仲夏淑笔。”诗后钤有“乾隆御览之宝”、“惟精惟一”、“乾隆宸翰”三印。该诗也被收入乾隆《御制诗集·四集》卷15中。

那么,《大典》中有多少册上会有乾隆御题诗呢?据《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军机大臣奏遵查《永乐大典》内有御题诗章者一并呈览片(乾隆五十九年十月二十日)”载:“遵查《永乐大典》,内奉有御题诗章者,共十三册,又卷末一册,谨一并呈览。谨奏。”^③可知,《大典》中一共有十三册有乾隆御题诗。这一数量相对于乾隆时尚存的九千余册《大典》来说,只能算是很小的一部分,所以能看到有御题的《大典》是非常不容易的,故金梁《光宣小记》“永乐大典”载:“《永乐大典》藏翰林院内,自庚子后经外务部向各国联军索回者,不足二

①王重民信中提到为北平图书馆购得的那一册《大典》(农字韵),应是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大典》卷623—624这一册。该册属一东韵,所收内容为“农”字事韵及诗文等。

②[英]David Helliwell《英国图书馆所藏〈永乐大典〉》,载中国国家图书馆编《〈永乐大典〉编纂600周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264—306页。该册《大典》属十罕韵,所收内容为“馆”字事韵及诗文等。王重民信中提到此册“据说后来落入日人之手”,可能是传闻有误。

③张书才主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372页。

百本,分装二箱。光、宣之际,章一山同年曾见有乾隆年御题者,尤不多觐。”^①可见,章授(一山)也是看到过《大典》上的乾隆御题诗的。

总之,《大典》中肯定是有乾隆御题诗,而且一共只有十三册《大典》有乾隆御题诗,因此,有御题诗的《大典》自然就尤显珍贵,故王重民对其索价太昂也只能慨叹而已:没有御题的《大典》卖六镑半,而有御题的《大典》卖一百五十镑,相差达二十多倍。

二、《永乐大典》上为什么会有乾隆御题诗

我们知道,乾隆有在所阅之书上题诗之习惯,其《御制诗集》中即收有不少这种御题诗。例如,在四库馆开馆期间,乾隆对一些他认为特别好的采进书作了御题诗,这些御题诗就是直接题在这些采进书原本之上的。四库馆后来还将这些有御题诗的采进本优先发还进书之家,以表彰这些藏书家的献书之功。若据此推测,那么,《大典》上有乾隆御题诗,是否意味着这些御题诗是乾隆在浏览《大典》时直接题在上面的呢?显然不是,因为乾隆虽然曾看过一些《大典》原本,但没有证据表明乾隆——看过他题诗的那些《大典》原本。正如王重民所说的:“因为那册内有一书是《清(重)明馆伴录》,乾隆特为那部书题诗”,乾隆的题诗是针对于《大典》中所收的佚书(如《重明节馆伴语录》)而言的,也就是针对于《大典》本而言的。因此,乾隆的题诗,最初其实是题在大典本之上,然后才被装入《大典》的。关于这一点,我们通过于敏中的信札可以了解得更清楚。

于敏中《于文襄手札》收有多通有关御题诗的信札,例如,其第一通云:“御题《井田谱》有注,《经世图谱》有序,因字多未全写,将来眷冠卷首,似需备载。尊处如无准稿,可即寄信来,以便抄寄。”第二通云:“御制《经世图谱》、《井田谱》、《春秋辨疑》三篇录稿附寄,可照入。”第七通云:“昨送到马裕家书十种,内《鹖冠子》已奉御题,先行寄回,即派纂修详细校勘,……现办写刻篇数,自应各卷各编卷前首冠御题(御制诗合注再行录寄,以便恭载),次及原序,附以提要。……(校勘发写时,首页御笔似应拆下尊藏,俟办毕再行订入。再,凡奉御题之书,应刊者即在京城办理,不必发往各省刻版)。”第八通云:“又另札并御制诗连注稿,同《鹖冠子》另寄。”^②以上所提到的《经世图谱》、《井田谱》、《春秋辨疑》为大典本,《鹖冠子》为采进本。据上述可看出:

其一、乾隆当时题诗时并没有一一查看《大典》原本,而只是审查馆臣办理的采进本、《大典》本等书。其时《大典》本的初辑稿本、采进本进呈御览,乾隆看过后,即在上面题诗。御题诗一般是写在《大典》本或采进本的首页。例

^①金梁:《光宣小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31页。章授,字一山,浙江宁海海游(今属三门)人,光绪三十年(1904)进士,由庶吉士授检讨。

^②于敏中:《于文襄手札》,国立北平图书馆1933年影印本。括号内的文字,在原信中是小字。

如,《鹄冠子》上有御题诗,故在抄写《四库》正本时,其首页御笔就先拆下尊藏,以免污损。

其二、乾隆题诗时,所题只有诗而没有诗注及诗序。这也是一般题诗的习惯。例如,台北“中央”图书馆所收藏的卷 8339 这一册《大典》乾隆御题诗“题陈规《守城录》”就只有诗而没有诗注,而《四库》所收陈规《守城录》书前“题陈规《守城录》”、乾隆《御制诗集·四集》卷 15 所收“题陈规《守城录》”则均有诗注。正因如此,御题诗的注及序,于敏中会另外抄寄给四库馆臣,以便抄入《四库》正本。

那么,乾隆在《大典》本上的题诗怎么会出现在《大典》原本上呢?这应该是后来重装所致。例如,台北“中央”图书馆所收藏的卷 8339 这一册《大典》,其御题诗“题陈规《守城录》”不是书于《大典》原书空白页上的,而是另纸书写,然后装入为全册首叶的。可见,《大典》中御题诗一叶应是乾隆御题的原件。关于这一点,也可以从其笔迹及所钐的“乾隆御览之宝”、“惟精惟一”、“乾隆宸翰”三印看出。

另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大典》书衣上的书签一般写为“永乐大典卷xxxx”,而该册《大典》的书签却写为“御题永乐大典卷八千三百三十九”,多了“御题”两字。笔者推测,凡是有御题诗的《大典》,其原书均经过重装和改签:翰林院官员将乾隆御题诗一叶从《大典》本中拆下,装入《大典》;将《大典》原本的书签换掉——原书签应为“永乐大典卷xxxx”,重装后改为“御题永乐大典卷xxxx”。册面书签增加“御题”两字,说明此册《大典》内有御题诗。前述翰林院官员能够从当时九千馀册《大典》中共找出十三册有御题诗的《大典》,大概应是得益于这些书签变动的提示。

如果上述的推测正确,那么,《大典》卷 7602-7603 一册(现藏国家图书馆善本部)亦极有可能有乾隆御题诗,因为:该册书衣上的书签上写“御题永乐大典卷七千六百二之七千六百三”^①;其所收主要是《武林旧事》、《西湖老人繁胜录》、《都城纪胜》的内容,其中《都城纪胜》的内容最为完整,而乾隆御题《大典》本诗中恰好就有一首为“题南宋《都城纪胜录》”^②;该册似乎被改装过,其衔名叶是乾隆时新抄的,其格式与其它各册《大典》衔名叶格式不太一致^③。因

①周叔弢《周叔弢藏书经眼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56 页载:“御题永乐大典(七六〇二,七六〇三,杭字,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一本。(赠北京图)。”该册原为周叔弢所藏,周氏于 1951 年 8 月将其捐赠给北京图书馆。

②《都城纪胜》在《四库》中著录的不是《大典》本,但是,其《大典》本亦已辑出(参于敏中《于文襄手札》第 48 通),而且乾隆有题诗即“题南宋《都城纪胜录》”,收入乾隆《御制诗集·四集》卷 13 中。

③《大典》书后衔名叶在乾隆开四库馆期间均被裁剪过,往往只剩下该叶的一小半或一小片。参拙文《永乐大典余纸考》,载《史林》2010 年第二期。因此,若该册《大典》要重装,应该会撤换掉原来的衔名叶,而用另纸重抄。

此,尽管目前该册卷前并未见有乾隆御题诗,但据上述情况看,笔者推测其原来曾装入过乾隆御题诗,而该御题诗后来又遗失了。

最后,还需要说明两点:

其一、据前引《于文襄手札》第七通云:“校勘发写时,首页御笔似应拆下尊藏,俟办毕再行订入。”也就是说,怕对书前御笔有污损,在发写时,先将这叶拆下,待办完后再订入原书(底本)。那些采进书的底本,有御题的是奉旨先发还的,据“谕内阁赏鲍士恭等《古今图书集成》周厚堉等《佩文韵府》各一部”(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十四日)载:“其进书百种以上者,并命择其中精醇之本,进呈乙览,朕几馀亲为评咏,题识简端。……其已经题咏诸本,并令书馆先行录副,即将原书发还,俾收藏之人,益增荣幸。”“多罗质郡王永琿等奏请将四库全书底本汇交翰林院收贮折”(乾隆五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载:“伏查各省藏书家送到各书,内奉有御题者,业经臣馆随时录副,将原本敬谨发还本人,祇领珍藏;其馀选入抄录项下者,俱即将送到之书充作底本,次第发写。”^①这其实是对献书人的一种褒奖。

其二、与采进书相同,《大典》本在办理时,也应该会拆下御笔。不过,与采进书不同的是,《大典》本在抄成正本后,其稿本即有御题的《大典》本就归翰林院收藏,没有必要再将御笔装订回稿本,因此,那些拆下的《大典》本御笔,就集中收藏在翰林院中,据“左都御史纪昀奏文源阁书覆勘先完请将详校官等分别议处折”(乾隆五十六年九月二十九日)所说:“……伏查御制《永乐大典》诗文,向在翰林院尊藏;御制各省遗书诗文,向系发交武英殿提调缮写。现已行文两处恭录全本,一俟覆到,即敬谨补入。”^②大概是待《四库》办完后,那些御题诗才被装订入《大典》原本中。

综上所述可知:其一、乾隆原是在《大典》本稿本上题诗的;其二、有些御题诗后来由翰林院官员重装入《大典》原本中。前引胡适信中说:“我要请问的是兄所说英伦所见一册《大典》,是否果真有御题在《大典》原本之上?我不信《大典》任何一册有御题。所题都是辑抄清本。”胡适的怀疑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即认为御题诗只能是题在辑抄清本即《大典》本稿本上^③。不过,胡适据此来否定《大典》中有御题诗则是不对的,因为胡适只知其一(御题诗原是题在《大典》本上),而不知其二(后来有些御题诗被重装入《大典》中)。

①以上分别见张书才主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11、1952页。

②张书才主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238页。

③关于乾隆御题诗题在大典本辑抄清本上的分析,还可参“胡适致王重民(1945年9月6日)”一札(载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台北胡适纪念馆编《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第416-418页)。

三、餘论

1. 如前所述,《大典》中一共有 13 册有御题诗。换言之,《大典》中一共收了 13 首乾隆为《大典》本写的御题诗。但是,查《四库》所收《大典》本书前御题诗及乾隆《御制诗集·四集》可知,乾隆给《大典》本题的御制诗共有 31 首,即:“题陈规《守城录》”、“题《至正条格》”、“题萧楚《春秋辨疑》”、“题《大金德运图说》”、“题宋仁宗《洪范政鉴》”、“题夏休《周礼井田谱》”、“题《宋中兴圣政草》”、“题《旧五代史》八韵”、“题刘摯《忠肃集》六韵”、“题毛晃《禹贡指南》六韵”、“题傅寅《禹贡说断》六韵”、“题《庆元党禁》”、“题胡宿《文恭集》”、“题倪思《重明节馆伴语录》”、“题《敬斋古今註》”、“题《九章算术》”、“题《墨法集要》”、“题《元宪、景文集》”、“题《帝王经世图谱》”、“题《南宋两朝纲目备要》二首一韵”、“题郾道元《水经注》六韵有序”、“题袁燮《絜斋集》六韵”、“题李若水《忠愍集》”、“题仇远《金渊集》”、“题《絜斋毛诗经筵讲义》”、“题郝经《续后汉书》”、“题《乾坤凿度》”、“题《易传灯》”、“题袁燮《絜斋家塾书钞》”、“题南宋《都城纪胜录》”。也就是说,这 31 首御题诗中,只有 13 首被装入《大典》。那么,装入《大典》的是哪 13 首御题诗呢?

我们可以从明确知道有御题诗的《大典》来寻找答案。就目前所知,《大典》原本上收有御题诗的是:卷 8339 一册,所收御题诗为“题陈规《守城录》”;卷 11312-11313 一册,所收御题诗为“题倪思《重明节馆伴语录》”。《守城录》只有四卷,而且是被《大典》比较完整地收入的,卷 8339 一册所收大部分即为《守城录》的内容。《重明节馆伴语录》只有一卷,而且也是被《大典》比较完整地收入的,卷 11312-11313 一册中的卷 11312 所收也主要是《重明节馆伴语录》的内容。因此,有御题诗的这两册《大典》的共同特点是:御题《大典》本被《大典》比较完整地收入;御题《大典》本的篇幅一般不大。事实上,我们据常理也可以推知:若御题诗要被装入《大典》中某册,则该册《大典》肯定是比较完整地刊载了该御题《大典》本的佚文,否则装入就无意义。因此,这些御题《大典》本在《大典》中基本以整书的方式存在,而不是以散片的方式存在(即分散在《大典》各卷中)。而根据以上总结的有御题诗的《大典》的特点,亦可以进一步印证笔者前面的推测——《大典》卷 7602-7603 一册极有可能收有乾隆御题诗“题南宋《都城纪胜录》”,因为《都城纪胜》一书篇幅不大(只有一卷),而且完整地收在该册《大典》中。

总之,在装入《大典》的总共 13 首御题诗中,肯定是包括“题陈规《守城录》”、“题倪思《重明节馆伴语录》”这两首的,也极有可能包括“题南宋《都城纪胜录》”这一首。至于其余的 10 首,根据以上总结的有御题诗的《大典》的特点,并结合以上 31 首御题诗所题《大典》本的实际情况(主要据《四库全书总目》看其在《大典》中是整书还是散片,篇幅大小),笔者推测有可能是出

自“题《乾坤凿度》”、“题《至正条格》”、“题萧楚《春秋辨疑》”、“题《大金德运图说》”、“题宋仁宗《洪范政鉴》”、“题夏休《周礼井田谱》”、“题《宋中兴圣政草》”、“题傅寅《禹贡说断》六韵”、“题《庆元党禁》”、“题《墨法集要》”、“题《南宋两朝纲目备要》”、“题《帝王经世图谱》”这12首御题诗中。

2. 对于四库馆采进书而言,一般有御题的均是乾隆认为特别好的书。但是,对于《大典》本而言,有御题的则不一定是特别好的书。因此,有御题的《大典》本,有的被著录入《四库》,有的被《四库总目》存目,有的既不被著录,也不被存目。例如,在所有上述有御题的《大典》本中,入存目之书为:《至正条格》、《洪范政鉴》、《周礼井田谱》、《重明节馆伴语录》。既不被著录,也不被存目之书为:《宋中兴圣政草》。至于《都城纪胜录》,《四库》所收则为非《大典》本。此外,其余之御题《大典》本均被《四库》著录。那么,四库馆臣是根据什么标准来处理这些有御题的《大典》本的呢?

其实,在办理之初,总裁认为这些有御题之《大典》本均应被抄入《四库》,据总裁于敏中写于乾隆四十年七月初七的信云:“《井田谱》等曾经御题之书,必应抄存。”^①但是,后来大概有馆臣觉得有些《大典》本御题诗对这些《大典》本是批评的,对于是否将这些《大典》本均收入《四库》有疑惑,故于敏中在给总纂官陆锡熊的回信中解释说:“至《永乐大典》内御题各书,如《井田谱》未经深斥,自应抄存。其余如《重明节馆伴语录》、《都城纪胜录》、《中兴圣正草》亦在驳伤之列,其应否抄存,自应通行酌核,非匆猝所能遽定也。”^②可见,于氏的态度后来有变化,即认为并不是所有有御题者均应抄存,而应该根据乾隆御题诗的评价来处理这些有御题诗的《大典》本:如果乾隆批评不重的,应抄入《四库》;批评重的,则不抄入《四库》或不存目。

总之,有御题的《大典》本,大部分被抄入《四库》,一小部分则只是存目,而极个别的则连存目也不收。显然,乾隆御题诗对该《大典》本的评价,对《大典》本的命运(是否抄入《四库》)是有决定性影响的。

3. 四库馆开馆期间,乾隆对不少四库馆所办之书作有御题(包括上述御题《大典》本之诗),馆臣曾将其汇编成六卷,置于《四库全书总目》卷首。乾隆对这一做法表示反对,据“谕内阁着将列朝御纂各书分列各家著撰之前并将御题四库诸书诗文从总目卷首撤出”(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三日)载:“至阅其总目,特载朕前后修书谕旨及御题《四库》诸书诗文为卷首,所办未为尽协。《四库全书》体大物博,将来书成之日,篇帙浩繁,举何为序?所有历次所降谕旨,列之总目首卷以当序,事属可行。且官撰诸书,亦有以谕旨代弁言者,自不得不如此办理。至朕题《四库》诸书诗文,若亦另编卷首,将来排列,转在列朝

^①于敏中《于文襄手札》,第38通。

^②于敏中《于文襄手札》,第48通。

钦定诸书之前,心尤未安。虽纂校诸臣尊君之意,然竟似《四库全书》之辑,端为朕诗文而设者,然朕不为也。着将所进诗文六卷撤出,仍分列入朕御制诗文集内,俾各为卷首,则编排在列朝钦定诸书之后,而《四库》书内朕所题各书诗文,列在本集首卷,庶眉目清而开帙了然。将此谕令馆臣遵照办理。钦此。”^①乾隆指示将这六卷诗文从《总目》中撤出,分别列入乾隆《御制文集》和《御制诗集》中,并且分别作为诗、文集的卷首。至于《四库》各书中所收的乾隆御题诗文,乾隆认为可以列于这些书之前。

显然,四库馆遵照乾隆的指示作了修正:目前《四库全书》中有御题诗的各书,均是将御题诗列于该书之前的,而《四库总目》之卷首确实也没有收乾隆的御题诗文。不过,从《总目》撤出的那六卷御题诗文,并没有按乾隆原来指示的那样,分别置于乾隆诗文集之卷首,而是据写作时间先后散入乾隆诗文集各卷中,其中御题《大典》本诗均收于乾隆《御制诗集·四集》中。至于个中原因,可能是乾隆后来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总之,《永乐大典》中确实有乾隆御题诗,而且是乾隆的御笔。不过,这些御题诗并非是直接题在《大典》之上的,而是题在《大典》本之上,然后由翰林院官员重装入《大典》的。《大典》中只有13册收有乾隆御题诗,而乾隆御题大典本诗则有31首之多,因此,并非所有的《大典》本御题诗均被装入《大典》。目前存世的《永乐大典》残本只有四百餘册,而就笔者所知,存世《大典》中有乾隆御题诗的只有上文提到的那两册,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两册《大典》应该算是珍品中的珍品了,值得我们格外地关注和重视。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①张书才主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1289-1290页。